

【理论探讨】

从固态到液态： 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的嬗变与思考

丁华东 周子晴

【摘要】鲍曼的“流动的现性”理论为研究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的嬗变提供了思想工具,通过对社会液态化的考察,液态的叙事方式、传播语境、权力分配和消费行为构筑了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嬗变的时代背景。液态档案记忆再生产呈现出档案记忆主体从分离向交互演化、档案记忆客体从有界向无界延伸、档案记忆物态从沉重向轻灵迁移、档案记忆体验从观看向沉浸衍变四个表征。与此同时,液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正面临着失衡失序的威胁:档案记忆限度过大影响记忆治理失灵、档案记忆内容有限抵抗社会失忆无力、档案记忆形式离散疗治受众空虚心理乏力。据此可以从重视话语力量,构建档案记忆传播新媒体平台;推进数字人文,打造档案记忆虚拟空间;强化个性推送,推动档案记忆主动消费;依托多感官互动,促发档案记忆沉浸式体验等方面适应时代变革。

【关键词】档案记忆;再生产;液态记忆;记忆建构

【作者简介】丁华东,博士,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理论范式、档案记忆、档案开发利用、电子文件管理等,E-mail:dinghuadong@shu.edu.cn;周子晴,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原文出处】《档案学通讯》(京),2021.6.13~21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流动的现性》中以一种类比、直观的方式,勾勒出一幅现代社会从固态(solid)转化为液态(liquid)的历史景观。相较于固体,液体“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流体非凡的流动性,使人把它们和‘轻灵’这种想法联系在一起。”^[1]在前现性社会,人类赖以经验生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往往是僵化的,社会制度、社会阶层与财富划分总体固化、缺乏流动,宛若一块磐石。现如今全球化浪潮席卷,既定的模式、规范和准则不断变化,已有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说是‘不证自明的’”,“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2]

当代学术研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交叉性、融

合性特征,近年来“液态”话语经历了从社会学领域向新闻学领域的迁移过程^[3],也为笔者借用鲍曼“流动的现性”理论考察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形态嬗变带来灵感和启发。前现性社会中记忆通常由少数权力集团书写、延续和操控,地域当权者记忆、精英群体记忆和国家大事件记忆挤压社会记忆的个体化发展空间,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固态特征。^[4]随着人们个人意识从蒙昧到觉醒,在全球化视域下,记忆传播媒介的演进、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引发社会记忆全局性变革。此刻转瞬间就成为过去,切近的过去转瞬又被更近的去所覆盖,因为时间在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增值,记忆也变得似乎比以往更具流动性。^[5]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一方面具有社会记忆的共性,如选择性、重构性、传承性、现实性、成型性等^[6],与社会记忆的发展逻辑、从固态到液态的演进路径趋于一致性;但另一方面与其他社会

记忆相比也有自身特质,作为一种刻写记忆、文本记忆和存储记忆,具有原生性、真实性、稳定性、明确性等特征。近年来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开启了档案记忆研究的新视野,“是生产与再生产不断重复、交替、循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档案记忆被不断地被激活、重构、重新生产出来,成为被加工的‘人工制品’”^[7],这可从两个层面理解。第一层含义是档案记忆不断地、连续性生成与积累的过程。有别于档案记忆建构论,记忆建构论着眼社会记忆由当下的关注所形塑,而档案记忆再生产过程聚焦社会连续性问题,是对社会实践活动不间断的记录,从历史连续性角度将档案记忆生成的过去、现代、未来串联起来;第二层含义是从原生档案记忆形态向次生档案记忆从文本、内容和意义的反复转化与重构过程。原生档案记忆形态是指档案记忆生成后未被改变最原始的样态,加工档案记忆体现为档案记忆社会化的结果,对档案记忆重新提取的复活行为、过程和结果,也是档案记忆由遮蔽转向澄显、由存储记忆转向功能记忆的行为、过程和结果^[8],是档案记忆被不断地提取、加工、形塑、利用、强化,产生新的档案记忆制品的过程和结果。档案记忆再生产表现为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的双重运行和交互转变过程。在社会液化化环境下,档案记忆再生产正面临着从固态到液态的形态嬗变,因此通过耙梳其液化社会背景,澄明档案记忆液化的具体表征,剖析建构液态档案记忆的迷思和困境,以明晰面向未来,可为档案部门应对此时代变局提供重要着力点。

1 社会液化化: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嬗变的时代背景

鲍曼将现代社会的改变从“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共同体”5个维度进行液化化特征分析。^[9]正如尼可拉斯·加尼(Nicholas Gane)所言,“过去十多年鲍曼已经探测了他称之为液态现代性的诸多方面。抛开其他事情,该状况的主要特点在于:社会纽带的脆弱和短暂;责任从国家滑落到个体;从公民到消费者的转变;以及新的分离形式的出现,超出主权国家的权力。”^[10]由此可知液态社会主要表现为:权力溢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开始走向全球化,助推消费者社会来临和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因此随着人

类文明和科技的不断进步,碎片化和多中心主义的生活状态,作为原材料,正不断地侵袭和改变着当今社会的叙事方式、传播语境、权力分配和消费行为,从不同程度不同层面重塑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使其显现出液态特征。

1.1 液态的叙事方式丰富档案记忆生产

随着社会叙事主导地位从国家叙事向个人叙事扩张,档案记忆生产表现出多元转向。早在古希腊,叙事的本领被称为是记忆女神谟涅摩辛涅(Mnemosyne)的馈赠。在人类早期文明中,运用文字叙事的人员属于特权阶层,他们手握政治、经济、宗教和司法等各项职权,叙事与知识、治理、权力紧密交织。除了一丝不苟的客观化全知叙事的制约,叙事者自身的道德主体意识随之彰显。高小康曾指出:“在正史中,作者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历史道德意识的体现。”^[11]其背后真正支持历史与记忆书写、流转的则是统治阶级的赋权,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和国家主旋律。此时的叙事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固态性,个人叙事如民间乡俗稗志和神话传说等被视为“野史”,其传播广度和流传时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作为集体叙事和国家叙事的补充材料,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记忆再生产过程,二者既相互建构又相互博弈寻求共谋。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现代化推进,语言学、叙事学、人类学等学科迅猛发展,一些国家的民俗学先后注意到日常交流实践中个人性口头叙事的重要性,关于“个人叙事”这一概念的研究逐渐增多。^[12]近年来随着新型社交媒体的兴起,博客、微博、日志、短视频等多种网络化的个体记忆书写日益普及,个人叙事逐渐观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具备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建构力量,新媒体时代叙事方式具有极强的穿越感和延展性。档案作为历史叙事的载体和主要内容之一,始终与其保持步调一致,二者相得益彰双向影响。因此,随着社会叙事方式的液化化,档案记忆生产表现出从国家性到个体性的转向,“个人存档”的需求和重要性渐显,成为社会有机体流动状态下的自我存续重要手段。譬如,档案记忆作为“边缘人群”的重要话语表达工具,新兴的农民工档案、女性主义数字档案馆、殖民主义档案馆和同性恋群体档案馆等无不喻示档案记忆的主体

逐渐从社会中心扩大覆盖至边缘地区。

1.2 液态的传播语境助力档案记忆传播

随着社会传播语境从单向的稳定性向碎片化的即时性迁移,档案记忆的传播呈现出多向性和瞬时性。记忆的记录传递方式与传播革命直接相关,媒介技术的进步使记忆的保存、传播甚至代际传递都变得更为容易。^[13]在人类早期社会,当过去成为记忆走进历史,过去便已定格,无论现在对过去如何认知、诠释与解读,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已经成为静止的客观事实,将过去作为一个建构的过程,其行为脉络是可控的,因此集体记忆处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时空关系中。^[14]过去档案记忆的生产、建构、传播、消费都需要借助消耗具象的时间、空间和过程,人们无法跨越时空限制即时精准获取所需的档案记忆。现如今随着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系统不断融合演进,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15]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16]新的传播技术的确提高了人类控制空间的能力,缩减了传递信息的时间,将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和“权力的终结”。^[17]档案记忆传播语境液化程度逐渐提高,媒介形态之间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融合一体”的媒体时空呼唤个性化的解放和彰显,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碎片化场景化的传播语境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顺序,个性化推送让档案记忆能瞬时精准投放,除此之外超越本体、本族群、本国别的档案记忆也得以覆盖全球,档案记忆的传播限度和边界日益扩张。

1.3 液态的权力分配削弱档案记忆控制

随着社会权力逐渐从中央向边缘、从庙堂向民间位移,档案记忆控制逐渐被弱化,流动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强调,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18]当权者对权力的控制程度越严酷,社会记忆作为维系“社会缔结组织结构”手段

的影响力就越高。^[19]古往今来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一方面档案记忆作为重要的权力资源维系和支持权力的正统性,另一方面档案记忆的创造、刻写、修正与遮蔽、强化都受权力控制,档案记忆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被随心所欲地增添、移除与塑造,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曾考察德国和日本两个二战发起国对待战争记忆背道而驰的两种态度,前者利用档案、仪式等以悔罪的方式承担责任;后者则通过销毁相关的档案材料、篡改教科书等方式抵赖和阉割史实,日本国民对此单向度盲从^[20],由此可见当局者的意志能控制档案记忆的强化和忘却。传统社会档案记忆在强权控制下呈现出强烈的固态、沉重特性,无论是生活日常、饮食礼仪、嫁娶婚俗、祭祀参拜的书写和记录,都由官方施行才具有权威性和正统性。而当今社会,档案记忆话语权已发生一定位移,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个性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逐渐迈进“后权威时代”,层级性不再那么明显。^[21]每个人都可成为档案记忆书写的主体,记忆不再是一家之言,档案记忆的控制力度逐渐被削弱。

1.4 液态的消费行为促发档案记忆消费

新媒体时代,新鲜事物井喷式涌现,公众的消费习惯向情感消费、文化消费、被动消费转变,也进一步促发档案记忆消费。斯捷潘·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 Mestrovic)在《后情感社会》一书中指出,“知识并不足以产生行为,而行为呈现的是情感和智力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在后情感社会变成了一种服务。”^[22]一方面随着VR、AR等前沿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人们在某些事务上无须“亲身”体验和感知外部世界,直播等拟(仿)真实性媒介互动的记忆形态模糊了真实和虚拟的界限,其特有的情感交互体验让档案记忆消费的热度持续居高不下,打造出互联网传播场域下的消费奇观;另一方面这一液态社会环境中充斥着未知和变数,诱发受众内心的焦虑、恐惧、创伤等不安全感,而怀旧情感及对过去美好回忆的依恋会加速档案记忆消费。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文化资本”这一重要概念,与“经济资本”如物质资源、财产,以及“社会资本”如人际关系、声望等构成资

本的三种基本类型^[23],而文化资本指的是“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24]文化消费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大势所趋和必然选择。档案记忆中蕴含和承载着多姿多彩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和文化习俗,近年来逐渐呈现文化消费转向。随着服务主动推送方式的普及,通过研究文化消费者的行为、习惯、爱好及生活环境等,有针对性地推送“按需服务”的信息和记忆,被动消费或将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又一新特征,这也对档案记忆主动推送个性化定制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2 四个转向: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嬗变的具体表征

相较于固态,液态往往呈现出交融性、无限性、不可估约性、不确定性、多变性、不彻底性等特征。档案记忆的固态化是指在传统社会中,档案记忆的内容、主体和媒介往往是被规定、被约束、被划界的。现如今档案记忆与载体的分离和档案记忆内容的重组更为容易,档案记忆再生产形态日益呈现出流动、轻盈的状态,正面临着重大转向,具体表现在档案记忆主体、档案记忆客体、档案记忆载体、档案记忆体验这四个方面。

2.1 档案记忆主体从分离向交互演化

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档案记忆主体在从固态到液态的嬗变过程中呈现从分离向交互演化的态势,固态物质相较于液态往往独立存在,彼此分离,有明晰的边界。在传统社会中,档案记忆所保存的历史记忆,经常只是一种正统的典范观点、真实无误的历史记忆,通常只有一部分人有权力记录与诠释历史。这种历史忽略了许多个人的、社会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25]社会分层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长时段地存在于我国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历史悠久,连绵不绝,虽然在不同朝代内容和规定各有发展增损,但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固态性早已根植于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土壤,在宗法制、门第观念、姻亲制度的藩篱下,统治者、权力阶层和社会精英作为历史的核心人物,扮演着档案记忆的主体,档案记忆的触角很难延伸到社会底层人物和远离社会核心的边远空间,记忆主体固定

且相互分离,彼此难以产生交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在新媒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助力下,普通公民个体开始上升到公共视野中来,新的网络虚拟群落出现,他们是流动的、不确定的,甚至有可能仅为商讨某事或征集意见而发起的“临时会话”,抑或出于某种情绪共鸣或兴趣相通而产生交集,例如微博中的超话社区或豆瓣里的兴趣小组。在档案界出现如“档案知网”“档案界”等受广大档案用户欢迎的学术知识社区。^[26]《档案管理》杂志社主办的“档案界”论坛、青岛档案信息网与青岛社区合作共同打造的“城市档案”板块、档案学贴吧、“档案那些事儿”“国际档案理事会 ICA”档案微信公众号的留言系统和问答生成机制等,都为面向群体交互的档案服务提供沃土。当下各种力量在变迁的社会现实下,从各自的文化结构与生存境遇出发,围绕档案记忆展开争持,力图建构于已有利的社会记忆,并最终实现“高妥”和统一。这种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混合和矛盾的竞争性多重叙述可以被视为为巴赫金·迈克(Bakhtin Michael)所说的“异质语”(Heteroglossia)现象。^[27]

2.2 档案记忆客体从有界向无界延伸

对照古今可以发现,档案记忆所承载的内容正从国家重大叙事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延伸,从有界向无界演变。不同于现代社会早期呈现出的“固态”特征,“液态”没有特定的形状,不受周围屏障的限制,在一定的因素推动下可无限延伸。传统的集体记忆叙事常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而忽视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探寻,记忆的建构与书写往往由官方权力和社会精英主导,民间话语严重缺位。^[28]诚然以往由血缘和功勋维系的权力机限制定了档案记忆的内容,通常倾向于保存、利用和诠释精英群体、英雄人物和特权阶级的日常生活记忆,如其言行举止、饮食起居、祭祀朝拜、宗教活动等,档案记忆基本上围绕权力阶层的维持、运作和更替展开。但随着社会液态化的程度日益加深,档案记忆的固有边界和准则被打破,尤其是互联网的实时更新和相关内容推荐机制让档案记忆呈现出滚雪球效应,档案记忆开始流动和融合。液态的传播环境催生了档案记忆走向碎片化和短时性,随着社交媒体档案、个人医疗健康

档案、民生档案、居民住房档案等这类新形式档案记忆日益兴起,档案记忆开始向民众日常美好生活转向,成为照亮微观视角下大众生活中的探照灯,档案记忆触角延伸至现代生活最细微的感觉末端。集体记忆的权力开始向普通大众流动,个人档案记忆丰富了集体档案形式和内容,缩小了官方档案记忆和民间档案记忆的鸿沟。甚至在一定层面上,官方话语的暧昧与不充分性、小人物相关故事记载的空白和模糊赋予大众记忆、民间记忆极大的可塑性、创造性和想象力,让个体有能力对整个社会大背景进行富有弹性的记忆建构。一言以蔽之,在当今液态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美好日常生活的记录和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能成为官方主导的档案记忆的不同横截面,建构类似晶体状的多面性、多重性的档案记忆。

2.3 档案记忆物态从沉重向轻灵迁移

鲍曼认为,“从沉重的资本主义过渡到轻灵的资本主义,从固态的现代性转变到液态的现代性,结果可能是一次比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本身的来临更为激进、更具深远影响的新的起点。”^[29]在档案记忆物态从沉重的实体态向轻灵的电子态迁移是其液化化进程中一个重要转向。我国传统社会档案载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历了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五个阶段的漫长演变,从不同层面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30]而传统的档案记忆载体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来源较为有限,档案记忆的建构、传播、重塑等再生产过程也需要依赖特定的时空关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精准投放实时获取。随着传播语境与权力关系的“液态”化,传统的档案记忆叙事内容与形式难以匹配流动的社会这一现实情境,电子时代的来临为档案记忆载体带来一场新的革命,实现从实体态向数字态迁移。在视觉文化异常发达的今天,无论是借助云台照相机、摄影、数码拍摄等手段,还是微博、微信、微电影、短视频、3D打印等方式,都能加速档案记忆载体和内容的分离和档案记忆内容的数据化整合,档案记忆以一种更轻灵更便捷的方式呈现和传播。在媒介融合语境下,大众早已进入“读图时代”,这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31]这也与大众传播格局从传统的“文字域”和“视听域”并行

向“数字域”转化^[32]的过程相吻合。从最初的口口相传、文字符号向视觉影像,最后再到数字形态档案记忆形态的演变,表明档案记忆再生产愈益生动形象、深刻真实地记录和讲述受众日常生活,档案记忆的形态越加灵活多变,更易于传播和流动。

2.4 档案记忆体验从观看向沉浸衍变

随着传播技术与传播语境的液化化转向,档案记忆实践也经历着从刻写实践向体化实践、从视觉时代向沉浸时代的过渡,液态档案记忆的浸染让人们宛若身处记忆的汪洋大海中,获取更有代入感、互动性强的消费体验,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传统媒介形态中图文泾渭分明的界限正在被视觉主导的全面融合所取代,“内容为王”的信条已经演变成“体验为王”。^[33]从口述、文本到视觉影像再到沉浸式体验,对档案记忆的传播、触发和再生产从来都不是被动接受与盲目消费,而是趣味选择与即景重构的过程。在传统社会,用文字或图片刻写传递的任何记录,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其撰写过程就此截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视觉现代性及其狂欢性的爆发,以视觉为主导的档案记忆传播常遭受不够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批判,多媒体社会新媒体技术赋能下的沉浸式的档案记忆体验或成最好的回应与证明,呈现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新特征。例如北京市档案馆《档案见证北京》^[34]展览上,人们可以聆听卖糖葫芦、卖水果的吆喝声,也可以听到老北京车水马龙的喧闹声,利用多媒体视听技术,反映北京近百年来新旧相衔的历史变迁;再如纪录片《二十二》^[35]以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幸存的“慰安妇”为选题,展示了中国幸存的22位慰安妇如今的生活状况,基于对真实历史的回顾和正义情感的吐露,沉浸式的记忆体验给受众带来静默的力量,达到“身心俱化”的效果,产生情感共鸣和身份认同。这让人专注在当前由设计者营造情境下所获的感官和心灵满足,加速档案记忆共享和交融。

3 失序失衡:档案记忆再生产液化化进程新挑战

集体的竞争与共生,个体的鼓励与彰显,叙事的整体性与深刻性、碎片化与平浅化,思想顿悟与感官留存,多截面液化化的档案记忆形态共存共通,液态社会中液态档案记忆再生产也表现出一定的无所适

从和混乱失序,社会记忆治理失灵、失忆浪潮席卷全球、受众空虚无措等问题亟待解决,档案记忆作为治理这些问题的良药也存在较深程度的无力和束缚之感,具体表征如下所示。

3.1 档案记忆限度过大服务记忆治理失灵

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记忆不仅需要治理、可被治理,而且在图像时代显得格外必要。^[36]从古至今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的博弈与牵涉,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相悖与交织,在现如今多元复杂的液态社会情景中逐渐到达顶峰。在固态社会中,权力对档案记忆的规训、抹除与修改在液态社会中如洪水决堤般被冲破,档案记忆生产、传播与消费过大的限度为公众压抑已久的欲望留有余地,呈现出一幅多媒体社会复杂的乱象丛生的记忆图景,社会记忆治理失灵现象应势而生。第一,记忆危机最基本的表征就是记忆失真。液态的传播环境、虚拟的网络空间、复杂的社会生态、自由的舆论场域、跟风的社会大众,都为虚假记忆的构造提供沃土,大大增加了辨别真伪的难度。第二,记忆的过度娱乐化催生消费景观社会中的莫大悲剧。多媒体时代互联网为集体记忆的生产和消费带来了集体记忆的价值祛魅,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时代,怀疑、狂欢、戏谑以及对宏大叙事的反抗加剧了公共仪式的形式化、空洞化、虚无化,使集体记忆失去了重要的依凭和载体。^[37]关于民族苦难记忆如战争记忆、大屠杀记忆等的娱乐化解读为档案记忆治理带来巨大威胁。第三,不健康、亚健康的记忆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为“不可告人目的”煽动爱国情怀,或明目张胆煽动暴力、危害社会公德的记忆等,成为档案记忆治理路途中的巨大障碍。而有限的档案记忆作为真实有力的历史记录,在媒介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多方混战的记忆竞争场中何以自持,多维度全方位维护历史真实,如何消除多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实践去中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记忆治理把控档案记忆自由的限度,成为较为尖锐的时代问题。

3.2 档案记忆内容有限抵抗社会失忆无力

记忆的另一面是失忆,在当下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遗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曾指出,失忆

常常是无意识的,记忆则需要“有意图地与过去打交道”。^[38]诚然,在一个以速度和遗忘为标记的现代社会里,更加突显出记忆的重要性。^[39]一方面,随着社会记忆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记忆越来越依赖于外部的“符号贮存系统”,更迭速度过快引发媒介失忆现象不得不敲响警钟。Michael Bugeja 和 Daniela V. Dimitrova 在研究了6种传播学专业期刊后发现,这些期刊所刊登的学术论文的网络脚注在论文发表一年后,竟然有近一半失效。而另两位学者发现图书馆和自然科学期刊竟有42.6%的脚注已经从原有的网络地址中消失了^[40],可以从论文脚注中管窥现代社会的巨大“信息黑洞”,由此引发的媒介失忆对记忆、知识与历史的吞噬。另一方面,在当今液态社会中,文化存在一定程度“异化”现象,由此引发的文化失忆现象也值得深思。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乡村向城市的中心迁移已成必然,这也是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日渐衰微的真实写照。中国农业大学孙庆忠教授曾呼吁,我们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留住乡村的文化与记忆就是当务之急。^[41]此外,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曾在其著作《社会健忘症》中批判了当今社会文化的去经典化,以及对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盲目追随,文化的无根可依引发了人类记忆的颠倒和错乱。因此,一方面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普及和数字存储技术的更新,数字档案记忆自身的媒介失忆问题也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档案记忆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增加档案记忆内容的限度,为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档案部门也不得不为,释放解放性力量。

3.3 档案记忆形式离散疗治受众空虚心理乏力

档案记忆在传承中经历了多种记忆载体的变迁,在商品经济化、消费娱乐化和现代城市化的冲击下呈现出“离散化”的趋势,群体档案记忆实践在增强自主性的同时,也带来个性化和浅显化问题,暗含着受众空虚心理的隐喻。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衍化,以微视频、自媒体等为代表的融合媒介引发档案记忆全局性的变革,对时空关系的切割和零星、细节化、差异化或不动声色的记忆呈现方式,也在深层次助推人们思维方式、认知判断能力的变革。受众在

社交媒体平台中更多地享有碎片化和表层化的记忆,常以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和无序式的点击滑动,这些记忆未能给观看者提供行动和思考的价值基点,使观看者失去了统一的时间脉络和恒久性的价值源泉,由此产生了空虚感。^[42]一方面受众的记忆体验只由即时的生活状态所统摄,这种轻浅、没有质感、没有历史感的记忆获取犹如隔靴搔痒,记忆空间被弱化,乡土、传统与现代的裂隙与冲突让受众陷入迷惘和身份认知的障碍。另一方面,算法与推荐机制修筑起信息“茧房”,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分发方式稀释了集体记忆形塑认同的可能性,导致集体记忆陷入“窄化”的困境^[43],个体宛若困兽生活在信息资本家修筑的圆形监狱中,人们只会选择和接触与自己意见相同或近似的人群和内容,采纳符合自己预期的观点,人与人之间深入沟通的缺位,以及个体叙事的无力引发受众的空虚感和贫乏感。一方面档案记忆形式的离散、碎片化和瞬时性无法传递直击心灵的理疗力量,抚慰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内卷化、被时代抛弃的竞争焦虑心理问题带来的诸多苦难;另一方面对档案记忆的人文取向和认同价值开发的力度亟待提升,如何利用科技传播人文关怀和人文理疗,甚至带来美学体验和可塑性生命力量的艺术仍是未知数。

4 变革应对:档案记忆再生产液态化进程新出路

4.1 重视话语力量,构建档案记忆传播新媒体平台

媒介与传播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曾指出,“媒介不只是社会的附属物,而是社会肌理的决定性因素。传播的仪式观并非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44]一方面媒介信息的传递能影响档案记忆生产,另一方面媒介仪式的建构能形塑档案记忆传播,因此档案记忆的传播方式至关重要。“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门户网站到论坛,从博客到微博微信,档案信息传播平台从单一走向多元。”^[45]近年来随着短视频这一新兴媒介在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异军突起,为碎片化、瞬时性的档案记忆传播提供了新阵地,其中蕴含的巨大公域流量和社会关注度在与主流媒体和传统媒体竞争中频频占领高地。根据2020抖音数据报告(完整版),抖音日活跃用户突破6亿,日均视频搜索次数超过4亿。^[46]相

较于传统的私域流量,这些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具有覆盖面广、运营成本低、推送机制更为成熟等优势,纵观当前档案相关社交媒体平台账号运营情况也不乏成功案例,例如抖音平台的“北京卫视档案”和“宝藏档案”官方账号,粉丝数超400万,获赞量近3000万,数据十分可观且更新频率快且稳定。考察发现其视频时长一般不超过一分钟,主要是国内外猎奇档案记忆的科普和特殊群体共同记忆的展演,因此可以借此经验耙梳新媒体平台下档案记忆的传播逻辑和机理,建构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传播新平台。通过优化算法推荐技术,深度挖掘档案记忆资源的丰富内涵,凝聚价值共识和情感社群。

4.2 推进数字人文,打造档案记忆虚拟空间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数字时代的产物,体现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相遇所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在不断地跨界与融合中发展成为跨学科研究领域,成为“全球性的、超越历史和媒介的创造知识和意义的路径”。^[47]对档案资源加以科学开发与利用,通过采集、加工、深层次处理和按照设计模型进行构建,呈现出新的知识体系,通过已知揭示未知,是数字人文发展的重要路径。^[48]近年来数字人文与档案记忆的交集不断纵深发展,因此坚持开展档案数字人文项目,或将发挥档案记忆真实性、生动鲜活等特质,开辟液态社会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新局面。一方面,档案记忆资源为数字人文提供一定的“数字仓储”,通过开展地方性特色档案数字人文项目,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影谷档案”(The Valley of Shadow)项目、北京童谣、台州记忆、承德记忆等,以赅续族群的记忆、维护一定的族群认同和情感认知作为共同的目标和宗旨,以鲜活生动的方式促进档案记忆再生产,沿袭从档案资源到档案知识到档案记忆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开展数字人文项目能从内容再生产、形式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三个层面推进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液态化进程,从文本的、抽象的、平浅的、流于表面的符号转换成多维的、生动直观的、叙事化的、艺术化的记忆空间,以记忆地图等形式实现群体与个人、真实与想象、文化与历史、写实与审美的多重对话。

4.3 强化个性推送,推动档案记忆主动消费

随着信息技术与物联网环境的日益成熟,用户

画像与个性化推荐已经成为液态社会的生活常态。按照鲍曼的观点,当今社会主动推送机制日益成熟,人们仿佛生存在一个由资本编织的全景监狱,个性化定制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局势,消费者正面临着由主动向被动的消费转向,档案部门要想在激烈的文化机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完善推送机制,增强综合竞争力。一是需要重新定位档案推送策略。感性经济时代消费者达成交易的决策基础不再只是价格和功能,而是受众内心感知,因此档案部门需要优化资源,按照新消费群体需求重新塑造产品,进一步完成档案记忆的怀旧情感、乡愁情感、文化认同情感转向,将开发重点聚焦在经典歌曲、影视作品的开发,以及基于地方怀旧的经典场景再造。二是需要重新界定档案记忆消费群体。聚焦边缘人群或弱势群体如农民工二代群体、留守儿童、失独老人等特殊人群,提供相应的档案记忆服务,彰显档案记忆的时代担当和人道主义关怀。三是消解个性化智能推送所构筑的“档案记忆茧房”。多元丰富的传播内容可以激活个体和组织兴趣的多样化,在记忆碎片化瞬时性的语境下,如何提供真正有益的内容,帮助个人或组织脚踏实地织就一个看似与世隔绝实则内心强大并能够最终实现价值升华的“记忆茧房”,需要在内容供给侧予以探索^[49],跳出人们的选择性心理招致的信息视野狭窄及记忆固化陷阱,数据化时代“算法+规则”的平台运营机理的精神内核就是数据相关性,要想实现算法逃逸,一方面需要将目光重新聚焦在“为什么”等问题上,往往一些反其道而行之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关注,此外当档案数据足够巨大时尚能与算法机制抗衡,推进档案记忆的主动消费。

4.4 依托多感官互动,促发档案记忆沉浸式体验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身体不再被看作是心智与外部世界的联结媒介,身体在位理论逐渐增多。^[50]感官作为身体感知外界,与外界交互的直接表征,可以作为档案记忆生产、建构、交互、激活的闸口,因此依托与主体的嗅觉、触觉、视觉、味觉和听觉等多感官互动能打造一个多维感知空间,促发档案记忆的沉浸式体验,进而助力人类主观意志和认同的族群边界建构、档案记忆文化内涵的唤醒与重塑,促发个人情感的认知与表达以及族群身份认同的强

化与维护。一方面,档案领域可以利用虚拟仿真、人工智能等新媒体科技打造档案文创产品。2018年3月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未来机械世界》就利用了AR数字技术,当打开绘本和APP时,传统媒介和数字媒介交互呈现着大开本的设计、未来感的音效。再如中国传媒大学倡导光明工程设计的跨媒体交互设计纸质模拟书《光明博物馆》,通过听觉、触觉、视觉、嗅觉多感官互动,完成视障人群的感官代偿,这些都为档案记忆再生产与档案记忆开发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档案部门可以推进档案记忆展览的改造升级,通过打造实体记忆空间,高强度还原记忆场景中的场景,包括所视、所听、所触、所闻以及所尝,使档案记忆与受众的互动进一步升级联通。

当前出现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熔化能力”的再分配和再定位的问题,“流动的现代性”让现代生活和其他特征一样,已经被个体化了。^[51]因此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档案记忆原有的边界、信念、准则、规范等陷入了再出发的时代困境。5G商业应用的开启,虚拟技术与人工智能即将带来更为丰富的应用场景,流动的叙事方式、传播语境、权力分配和消费行为推进了档案记忆再生产液态化进程,液态档案记忆作为一种新趋势和新转向,具体的演变路径和未来的发展之道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探索空间。此外,“液态”档案记忆作为记忆的一种状态和性质,并非一个已知的、不证自明的概念,有待档案学人深度探索。固态和液态的档案记忆也并非截然对立泾渭分明,二者之间的界线往往暧昧而模糊且共存共生,其形态嬗变也是相对而言的。无论如何,正如鲍曼所言,在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发展进步不再最终指向一个完美的状态,而是变成了一个持久永恒的挑战^[52],不断地质疑和反思才是最好的研究进路。

参考文献:

[1][2][29][51][5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現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24,198,33-34,118.

[3][9]李泓江,杨保军.“液态”理论的旅行及其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J].社会科学战线,2019(9):254-261.

[4]权力观照下的社会记忆正经历从集体记忆向个人记忆的转向,记忆的主体和内容多呈现为各方争夺的资源,具有很

强的现实和政治意义,在传统社会由精英群体和政治团体书写的官方记忆往往成为社会记忆的主旋律,存在着官方记忆与民间记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对立视角。

[5]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4.

[6][7]丁华东.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2,340.

[8]丁华东,陈展,杨寅.是“毒药”还是“良药”——论社会记忆档案化与档案记忆社会化的互化交融[J].档案学研究,2020(5):19-25.

[10]Nicholas Gane. Zygmunt Bauman Culture in a Liquid Modern world[J]. Sociology, 2012, 46: 1233.

[11]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12]毛晓帅.民俗学视野中的个人叙事与公共文化实践[J].民族文学研究,2019(3),57-65.

[13]方艾婷.基于政治仪式的后互联网时代集体记忆传播——以2019年国庆阅兵为例[D].兰州:兰州大学,2020:33.

[14][41]夏德元,刘博.“流动的现性”与“液态的记忆”——短视频在新时代集体记忆建构中的特殊作用[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5):38-42,53.

[15]蔡雯.媒体融合:面对国家战略布局的机遇及问题[J].当代传播,2014(6):8-10.

[16]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DB/OL].[2021-08-10].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17]文森特·莫斯科.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5.

[18]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导论.

[19]MCCARTHY E D.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05.

[20]BURUMA L. The wages of guilt: 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IMPORT][M].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1.

[21]陈潭,杨孟.“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力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105-111,2.

[22]MESTROVIC S G. Postemotional Society[M]. London: Sage, 1997: 1.

[23]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202.

[24]陈爱国.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J].学术论坛,2006(6):176.

[2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16.

[26]梁孟华.档案虚拟社区用户交互行为研究——基于用户调研数据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7(6):45-51.

[27]SMITH A L. Heteroglossia, "common sense," and social memory[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4, 31(2): 251-269.

[28]陈旭光.逻辑转向与权力共生:从网络流行体看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8(3):71-85.

[30]王贞.打开档案宝库,寻找历史印迹——《中国档案珍品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推出[J].北京档案,2019(11):4-5.

[31]夏德元.图像转向:读图时代的内容产业困局与出路[J].新闻记者,2015(6):67-71.

[32]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话[J].南京社会科学,2015(4):101-106,139.

[33]郑梓煜.视觉研究的跨界想象力——“视觉、观看与历史记忆”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摄影,2017(1):152-153.

[34]北京新闻.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开放啦!珍贵档案见证百年城市记忆[EB/OL].[2021-05-10].https://www.sohu.com/a/319525229_99966696.

[35]影市观察.《二十二》成首部票房破亿元纪录片[EB/OL].[2021-05-10].<http://www.ccitimes.com/shuzi/caijing/2017-08-22/9402.html>.

[36]李洋.福柯与电影的记忆治理[J].文艺理论研究,2015(6):52-60.

[37]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

[38]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2.

[39]严晓蓉.媒介、空间、记忆——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空间建构与审美研究(1988-2012)[D].杭州:浙江大学,2014:3.

[40]邵鹏.媒介失忆:数字技术光环下的“信息黑洞”——“短命”的网络脚注触发的警报[J].新闻记者,2009(1):77-80.

[42]孙庆忠.文化失忆:乡土中国的现实处境[J].中国乡村发现,2018(2):33-38.

[43]梁官宵,王处辉.媒介变迁与记忆重塑:短视频中的青年群体记忆实践[J].学习与实践,2019(8):108-116.

[44]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序言,5.

[45]赵佳佳.社交媒体视域下档案信息服务互动传播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8:40.

[46]抖音.2020抖音数据报告完整版[EB/OL].[2021-05-10].<https://v.douyin.com/erWWpvr>.

[47]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彼得·伦恩费尔.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M].马林青,韩若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12.

[48]霍艳芳,何思源.数字人文视阈下城市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8(1):29-34.

[49]陈春彦.碎片化传播中“信息茧房”研究反思——基于语境转换、茧房价值和主观能动性[J].新闻研究导刊,2021,12(3):1-6.

[50]巫达.感官、记忆与认同——感官人类学文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234.